



漫谈“移民乡井”之四川会馆

福建 王日根

如果说明清时期京师的会馆是以士绅试子会馆为主的话,那么清代成都乃至四川的会馆则应是以移民作为最初的驱动力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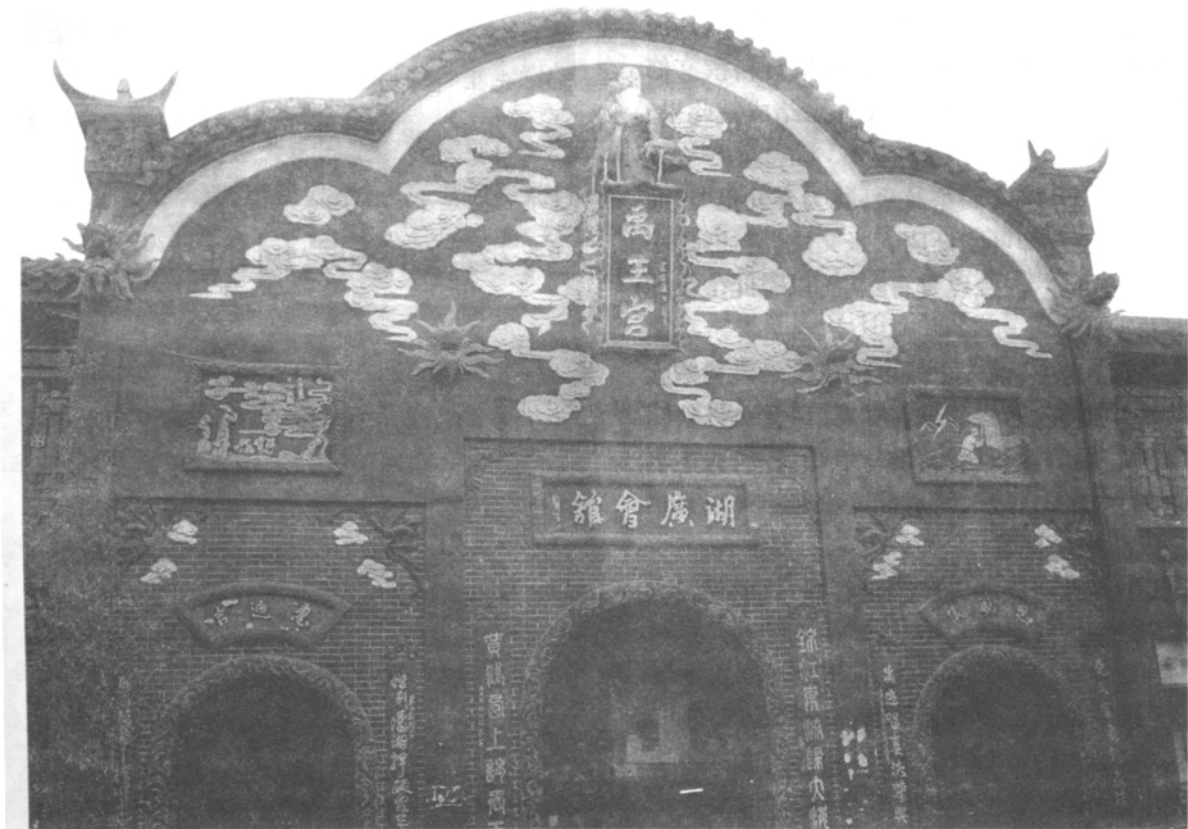
四川是移民会馆的集中地

清初的四川,因清兵入川及张献忠的农民战争,导致人烟稀少。康熙时采取优惠政策,动员从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江西、陕西、福建等省移民百万到四川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,四川经济得到迅速恢复。清人魏源在《古微堂外集》说:“张献忠屠蜀民

殆尽,楚次之,而江西人少受其害。事定之后,江西人入楚,楚人入蜀。”故当时有“江西填湖广,湖广填四川”之谣。

无论如何,延续明末商业繁荣之绪,清初的移民多带有商业性。他们聚集于乡镇乃至都会,谋求商业利润。由于同乡较易沟通,往往居住得较近,经营的行业也类似,同乡间的集体利益也更容易形成,直至建立代表自己乡帮的会馆。

最初的乡人联谊并不拘形式,同乡聚集较多的省份率先建立起会馆,目的在于聚集同乡商议事务。在成都,陕西人捷足先登,早在康熙二年 1663



成都洛带镇的湖广会馆



年)就建立了会馆。随后有江南馆、贵州馆、湖广馆、山西馆、两湖公所分布于成都各区,成都周围的乡镇也建立了不少会馆。譬如洛带,就有广东会馆、湖广会馆、江西会馆。馆内的一副对联说道:“云水苍茫,异地久栖巴子国;乡关迢迢,归舟欲寻粤王台。”俗语说:“家贫不是贫,路贫贫煞人”;“在家千日好,出门时时难”;离开乡井的人们确实遭遇到不少磨难。

会馆作为旅外同乡集会的场所自然具有了向心力。在成都总府街,有福建人修建的福建会馆,湖南、湖北人修建的湖广会馆;在金玉街有浙江人修建的浙江会馆,山东人修建的山东会馆,广西人修建的广西会馆;在正通顺街,有云南人修建的云南会馆,山西人修建的山西会馆;棉花街则有江西人修建的江西会馆;西糠市街有广东人修建的广东会馆;在布后街还有河南会馆、贵州会馆和北川会馆。

官商结合推动会馆扩建增宏

单有财力而没有权力,往往不足以支撑起一所会馆,土著的阻挠往往成为会馆无法建成的首要障碍。光绪初年,陕西同乡会在成都没有固定的地址,“老陕”(当时成都人对陕西人的称呼)们打算在城内买段地皮修会馆。一些成都人排外欺生,不愿意卖地皮给老陕。陕西人通过在川做官的老乡,多方说情、打点,拖了几年,才用高价把一个多年蓄满污水的烂泥塘连同周围堆垃圾的荒地买来。明知这是刁难,“老陕”还是咬着牙接受了。要修会馆,得先用土石填平这发臭的烂泥塘。少数心胸狭隘的成都人又节外生枝,不许“老陕”在当地取土。坚强的“老陕”竟做出了惊人的决定:由同乡会发起,凡从陕西到成都的陕人,每人都必须至少携一麻袋本乡的泥土,以填入烂泥塘。两年以后,“老陕”居然用一袋袋三秦大地的黄土把这近一亩的烂泥塘填平;接着,筹资建起一座气势雄伟的陕西会馆。陕西商人在苏州也有悲惨的遭遇。康熙五十二年(1713年)苏州织造李煦密奏说陕西商人“结党聚众,谋为不轨。”直至乾隆时三位陕西同乡官员到苏州任官,才解除了陕西商人的困境。

陕西会馆是旅川陕人祭奉先哲、议事会商、请亲宴友、会试借宿的地方。现存的陕西会馆,据大殿匾题记载,为光绪十一年(1885年)的陕西籍川省布政使程豫首倡,成都的庆益、益泰等33家陕人商

号集资重建,体现了官绅与商人的相互合作。殿顶覆黛色筒瓦,歇山顶的屋翘檐,底楼石柱擎柱承梁皆为粗大石柱,四方石柱到顶;其余则以精良楠木与底楼石柱联接直上檩梁,共104根,立于砖石阶基之上。木质门窗雕刻精细,斗方云饰彩绘飘逸。门厅别致,走廊悠悠,无论内外布局、造型装饰都凝重端庄典雅古朴,体现了古代建筑的优秀传统。殿前的两株古银杏枝叶随风摇曳,与庭院中的小桥、亭榭、幽竹,遥相呼应。底楼石柱上的楹联工巧,相向而列,更使大殿生辉。会馆的二楼辟为“银杏画廊”,画廊匾额为当代著名书法家刘正成手书。近年来有众多名家至此举办书画展览,引得文人雅士云集。会馆成为当地建筑水平最高的建筑之一。

走向融合

在会馆集中之区,会馆间的相互交流也成必然趋势。在四川中江,其地先民“多由闽粤楚赣而来,先至者或恣睢自雄。今则靡相齟齬,互通婚姻,欢洽大和,无复南人来土之患也”(民国《中江县志》卷二《风俗》)。在大足县,“清初移民实川,来者各从其俗,举凡婚丧时祭诸事,卒视原籍通行者而自为风气。厥后客居日久,婚媾互通,乃有楚人遵用粤俗,粤人遵用楚俗之变例”(民国《大足县志》卷二《风俗》)。在安县,“前清时县属民皆由各省客民占籍,声音多从其本俗,有所谓广东腔者,有所谓陕西腔、湖广宝庆腔、永州腔者,声音多浊。近数十年来交通便利,声音皆入于清”(民国《安县志》卷五十六《杂记》)。方言的交融是彼此分隔到相互融合的基础。

以风俗而言,互相迁染而形成的风俗亦比比然。在清代,四川灯会颇盛,灯会上演唱笙歌亦颇盛,其中最著名的《采茶歌》有这样的歌词:“二月采茶茶叶青,茶树脚下等鸳鸯。三月采茶茶花开,借部情依几何来。”考诸《岭南杂记》,潮州灯节时亦以唱《采茶歌》为盛,其中有这样的歌词:“二月采茶茶发青,姐妹双双去采茶,大姐采多妹采少,不论多少早还家。三月采茶是清明,娘在房中绣手巾,两头绣出茶花朵,中间绣出采茶人。”(民国《新修合川县志》卷三十五《风俗》)显然,四川的灯会茶歌与闽粤的灯会茶歌有源流关系。

各地会馆竞相在节日期间演戏以装点娱乐气氛,也吸引了大批的土客前来观摩。在四川,“各庙



每年各有会期,临期各有首事安排庆祝(《民国《万源县志》卷五《礼俗》)。每年六祖和天后的祭日是闽粤人演戏欢娱的重要节日。史载:“八月初三日为六祖会,粤省人演剧庆祝,十月初一日为牛王神诞期,农民演剧庆祝(《嘉庆《彭山县志》卷三《风俗》)。天全州“三月二十三日天上圣母会,演戏,各神祠祈禳春福(《咸丰《天全州志》卷二《祠庙》)。在有些地方,每至会馆的会期,“演戏多至半月,各街骑街搭台演唱秋报之戏,自八月起至十月下旬止,城外大小两河各街亦于十一月起至腊月底止,凡唱演秋报戏文,每日必有酒席,衣冠文物,共乐太平,美酒言欢”(《民国《新修合川县志》卷三十五《风俗》)。在金堂县,“清以来各寺庙会馆,赛神必演戏,任人观览(《民国《金堂县续志》卷四《礼俗》)。各个会馆几乎都以上演本乡籍的地方戏来显示自己的特色,于是在四川的戏剧舞台上,秦腔、潮戏、闽剧、粤剧等与梆子并驾齐驱,争奇斗艳,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气象。徽州的地方戏也因徽商而流布各地。在移民会馆集中的四川农村,外籍的农业技术、生产经验和作物品种等也在推广传布。如闽粤的种蔗种烟技术的传播便开辟了四川南溪、云阳等地新的致富之源。

从清初到民国的二三百年来,多个各认“乡土”的移民群自相联合,兼容并包,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四川本土居民逐渐融合,从而形成今天的四川人。如大竹县原有楚、湘、粤、赣、闽五籍之人,起初他们各建会馆,互不统属;到光绪五年(1879年)则设立起五馆公所的联合机构。公所职员由五馆推举充当,管理地方公务(《民国《大竹县志》卷二《建置》)。在犍为县,“道咸时各场承办地方公务,有五省客长之目,治城所属场镇亦多建有各省会馆,顾省籍虽异,而无种界上之分歧,用能各安于无事,以生以息,相助相友,县境遂成东土彬彬然(《民国《犍为县志》卷四《居民志》)。在灌县,旧有秦晋馆、湖广馆、广东馆、四川馆、贵州馆、江西馆、福建馆,到后来总称为“七省会馆”。“所谓七省会馆,是旧以客长轮总之,享荐各有其时焉……其在场集之会馆大率类是(《民国《灌县志》卷十六《礼俗志》)。客长轮总成为彼此走向联合的先声。而重庆的八省会馆则包括了广东、浙江、福建、湖广、江西、江南、山西、陕西等会馆。八省会馆的功能,几乎取代了官府的全部“市政”管理权。

在历史上,四川的客民会馆多以乡土神(如广

东人祀南华六祖,福建人祀天后,山西人祀关羽,江西人祀许真君,湖广人祀禹王,浙江人祀准提、安徽人祀朱熹等)的设置来确立自己的特色,从而区别于一般士绅试子会馆与其他工商城市的会馆。正由于移民们主要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,故他们更加务实,更加注重自我管理与彼此利益的协调,因而显得更加有序更加安定,从而为四川本土社会所接受。这类会馆因为少受政治因素的影响,地方观念才得以日显消融。这也与京师及省府城市会馆地方主义观念日见浓厚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作者:厦门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所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维他命、荷尔蒙、赐保命

曾任教

“维生素”英语名 *vitamine*, 源于希腊语的 *vita* (生命), 曾经意译为“生活素”, 稍嫌笼统; 音译为“维他命”, 又欠亲切。

“赐保命”, 作为药物的商品名, 容易让人一下子想到它能够保护生命。英语名 *permine*, 来源于希腊语的 *perma* (种子、胚芽) + *ine* (后缀) 构成, 表示那是精液素、睾丸浸液。曾用音译名“司配明”, 则缺乏引人联想的语言效应。

“荷尔蒙、荷蒙、荷尔蒙”, 英语名 *hormone*, 在希腊语中 *hormon* 表示“刺激、使之兴奋”, 如今用意译的“激素”, 通俗易懂。

虎子对龙池

实父

黄鲁直(庭坚)有痴弟, 蓄漆琴而不御, 虫虱入焉。鲁直嘲之曰:“龙池生壁虱”, 而未有对。鲁直之兄大临, 见床下以溺器蓄生鱼, 问知其弟, 大呼曰:“我有对矣, 乃‘虎子养溪鱼’也!”(《张伯驹《素月楼联语》引《后山诗话》)

“龙池”即琴腹, “虎子”为便壶, 雅语对仗, 自然获得诗人赏识。

